

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

张可荣, 刘奕汝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是一个互动共生、同频共振的过程,经历了 19 世纪后半叶的徘徊抗争、甲午战败后的群体觉醒与方向确立、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全面觉醒”与社会凝聚、抗战以来的普遍觉醒与空前增强等阶段。通过百年抗争,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留下诸多有益启示。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觉醒;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4-0036-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4.006

A Great Change from Self-Existence to Self-Consciousness: The Awakening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Times

ZHANG Ke-rong, LIU Yi-ru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times was a process of interactive symbiosis and resonance at the same frequency. It experienced several phases: the wandering and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group awakening and direction establishment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wakening" and social cohes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general awakening and unprecedented enhancement since the Anti-Japanese War.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chieved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self-existence to self-consciousness, which has left many useful inspirations.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awaken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数千年的历史演变所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近代中国人民在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出现的^[1]。经过百年抗争,“中华民族实

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2]。这一“伟大转变”既是中华民族在挨打受辱中奋起抗争、不断觉醒、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历史过程,又是中华民族走向精神独立、凝聚共同体意识、自觉构建

收稿日期:2020-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KS063)

作者简介:张可荣(1962—),男,湖南澧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和思想文化研究;

刘奕汝(1994—),女,新疆库尔勒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过程。现在,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历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相对薄弱的学术问题,有待深化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关于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动因,学界一般都强调外部挑战的推动作用,但对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传统和内生动力以及近代以来日益增强的主体自觉性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二是学术领域内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五四运动乃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历程及其整体面貌的科学认识,严重干扰了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三是由于西方民族理论和相关学术话语的长期影响,加之海峡两岸长期分治和一些民族分裂势力的长期干扰,造成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歧义与混乱;等等。本文仅就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历程做一简要梳理,期望对解答相关问题有所帮助。

一、经历 19 世纪下半叶的抗争徘徊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维新思潮和革命思潮中出现了群体意义上的觉醒

所谓“觉醒”,“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3](P304)}。觉醒是一个历史过程。近代中华民族觉醒是其对自身使命、地位及其与世界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是民族精神自主与独立、民族自信重拾与再造、民族能量积聚与释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唤醒、凝聚和拓展,形成了民族忧患与复兴意识、民族团结与统一意识以及民族国家建构意识。民族觉醒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既相互“包含”又一同“成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互动共生,又像历史前行的两轮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形成,首先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被动应对、缓慢苏醒阶段,这个阶段从 1840 年延续到 1895 年前后。

客观地说,迈入近代的中国并非就是“万马齐喑”,每次外患“都产生过体现觉醒的先觉者”^{[3](P303)},譬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畲、郭嵩焘、王韬等就是早期睁眼看世界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视野与思想表明中华民族不同以往的危机意识与世界意识的萌生。只不过,这样的觉醒意识并未迅速在不断降临的民族危机中形成气候,这些“觉醒的先觉者”在很长时间内都属于孤单的“个体觉醒”^[4],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3](P303)}。直到甲午战争前夜,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已经衰落,“许多人还盲目地自以为是‘盛世’”,即使是清末思想家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也“只能表示在盛世发几句危言”^[5]。这表明,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其历史传统的惯性是多么强大,中华民族觉醒之路遭遇重重阻力。这个缓慢苏醒的过程基本上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相伴始终,中国社会衰落到谷底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警醒的转折点。“沉睡的狮子”在世纪交替之际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时刻。这种状况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6]

19 世纪末,甲午战败、瓜分狂潮、八国联军入侵等系列民族创痛事件的接续发生,成为中华民族走出被动状态、实现初步的群体觉醒的重要导线。甲午战争竟败给东邻日本,这一奇耻大辱犹如一场强烈地震,震碎了朝廷上下“天朝上国”梦,宣告了“自强”“求富”运动破产,始有“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7]。继之而起的瓜分狂潮和八国联军入侵加速了民族意识觉醒步伐,“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开始”^{[3](P303)}。对于世纪交替之际中华民族的觉醒,不仅当时国人如梁启超、孙中山、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等多有论述,而且当时在华外国人士,如在近代中国生活长达 60 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8]、1898 年前后来华旅行考察的英国人伊莎贝拉·伯德(1831—

1904)^[9]等,也从西方视角觉察到“睡狮醒来”的种种现象。

中华民族具有群体觉醒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是两大群体,即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群体是走向“自觉”的先锋。他们率先创立“中华民族”这个标志性概念,并迅速把“中华民族”内涵从汉族论上升到整体论,认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体,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0],并企望建构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的民族国家。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群体,他们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并不断从“排满革命”中觉醒,迅速认同了维新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整体的观念,创立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并期望建构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制的民族国家。

在这两大觉醒群体眼中,中华民族的落后不仅表现在器物技术层面,也表现在社会制度甚至思想文化层面;不仅落后于西方列强,而且落后于东邻日本。两大群体催生的维新变法思潮和革命救亡思潮,推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迅速兴起与持续高涨,汇成民族忧患与复兴意识、民族团结与统一意识以及民族国家建构意识,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并取得标志性成果,即在中华民族旗帜下取得的辛亥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虽然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11]。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而言,辛亥革命凝聚和传播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志性符号,规定了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意涵和发展方向。

第一,“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核心概念与标志性符号得到初步传播与认同。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党人的“排满”意识迅速消退,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观念增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在摆脱了清王朝的统治后,心态趋于平静,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国内民族关系,更渴望多民族国家的成功建构。“人们在思考民族与国家整体利益、开展社会活动时,往往喜欢使用‘中华’二字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这从‘中华民国’成立后成千上万个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蜂拥而出的现象中即可见一斑。如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革命党、中华银行、大中华报、中华艺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等。”^{[12](P76)}

第二,维护民族团结与统一意识高涨。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高举“中华民族”旗帜,宣告“五族共和”与“五族平等”,“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曰民族之统一”^[13]。这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对此,熊十力曾这样评价:“民国肇建,五族共和,载在约法。将二十四史中,误视边塞先民为异族、为敌国之谬误观念,已经一扫而空。此为民族心理上之重大改革,最不容忽视者也。”^[14]

第三,实现民族复兴与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兴起。民族复兴意识是随着中华民族概念的创立与传播而生成的民族意识,并逐渐凝聚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强音符^[15]。与此同时,谋求台湾回归、实现国家统一成为辛亥志士和其他进步力量在兹念兹的牵挂。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由沙俄、英国等国际势力插手部分外蒙古王公和藏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同样引起了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蒙古族及藏族有识之士等的高度警惕,反对民族分裂与维护国家统一意识日益成为社会共识。

二、伟大的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推动中华民族“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由于历史惯性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清末民初的民族觉醒尚局限于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等社会上层群体;觉醒者对自身使命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仍未摆脱对外力的依赖,其动员和唤醒社会大众即“觉人”的意识也处于自发状态;中华民族整体性意识的传播受到诸多限制;等等。这表明,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凝聚,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迫切需要拓展与升华。这正是五四运动必然发生的历史逻辑,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也是五四运动载入史册的根本依据。

百年来,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时有争论,这属于正常现象,但要否定它则需要警惕。五四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具有全方位的影响,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还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等等,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和划时代的变革。五四运动凝结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爱国、进步、科学、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与精神独立的重要标志。

从中华民族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形成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16]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转折时机;十月革命的榜样作用和一战后的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加剧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催化剂;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和新文化运动熏染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中坚力量。运动中觉醒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唤醒各地国人”^{[17](P271)} 以共同拯救国家视为重要使命,

“劳工神圣”“庶民的胜利”观念迅速兴起和传播。运动的参加者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扩大到城市工人和其他阶层民众,运动的范围从北京、上海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从少数“觉悟的革命者”拓展到整个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亡的“星星之火”由此形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16]。特别是运动中工农的觉醒以及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在观察运动发展情况后这样总结说,“苦力崛起”是一战结束后上海“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17](P32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进步力量在五四时期的觉醒更彰显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意义。1919年5月6日,蒙藏学校全体师生致函北京《晨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蒙藏学生,亦国家之份子,爱国热忱澎湃不已。”^[18] 以共同表达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其爱国救国热忱。“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荣耀先、乌兰夫、李裕智、多松年等蒙古族优秀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内较早的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和优秀干部。”^[18]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如建党先驱向警予(土家族)、马俊(回族),卫国英烈韦拔群(壮族)、关向应(满族)等,都是在五四运动及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

其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9] 如果说中华民族意识从少数“觉悟的革命者”拓展到社会大众是觉醒的量的积聚,那么,中华民族意识“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就是觉醒的质的飞跃。这一飞跃建立在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和殖民行径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自身使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把握上,从而确立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增强了中华民族自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和敏锐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

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16]。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之举,就是近代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精神独立的体现。近代以来,中国对各种有损主权的条约并非没有抗争,但都未能逃脱屈辱的结果,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向西方列强说“不”^[20]。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曾发起颇具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要求废除协定关税以实现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实现司法自主等,这些皆为近代以来所未有^[19]。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工人运动兴起、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及“国民大革命”席卷全国,都是中华民族在全面觉醒中主宰自己命运的宣示。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总结民族民主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反思国民性格优劣的过程中,“一改过去对时局变化反应迟滞的状况而变得敏锐起来,追赶世界先进成为一种蓬勃兴起的社会意识。”^[21]这种敏锐性带来双重进步,即自身反省的不断深化和认识世界的自觉性增强,造成思想文化层面前所未有的“走出去”与“请进来”同频共振气象。一方面,觉醒的中国青年毅然漂洋过海寻找拯救民族的思想学说,形成留学热潮。另一方面,来自域外的各种“主义”潮涌大地,蔚为壮观。五四时期,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仅上海一地就先后有“近百位外国文化名人”到访^[22],构成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23]。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通过苏俄、欧洲或借道日本加速传入中国,在五四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主潮。正如当时人所言,“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形”^[24]。此时此刻,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单纯为追求学理,而是为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认清中国的出路所在”^{[12](P92)}。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又为中华民族认识自身和世界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中华民族、中国革命就像长江黄河在千里奔泻中虽然暂时遭遇到“很逼狭的境界”,但必能“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25]，“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26]。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1919年10月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发现了继续奋斗的磅礴力量,终于走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阴影,振奋起民族复兴的斗志。

其三,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断觉醒中的凝聚与传播、拓展与深化。突出表现为:一是推动了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普及。中国各族人民的“个人意识、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在启蒙运动中被唤醒、被增强。国家者,国民之国家,非统治者所私有,这样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常识”^[20]。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二是推动了民族整体观念的基本确立和比较广泛的传播。这一确立和传播的过程主要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展开,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新气象。三是推动了民族和国家建构意识的升华。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共同体问题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主要由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从思想和行动方面团结群众的方法,加速了中国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形态而达到统一。……中国知识分子循这些方向所加强的自觉和活动,仍是一件具有全世界性意义的事件”^[27]。四是推动了民族复兴意识的传播与增强。特别是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共同揭起民族复兴的旗帜,共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成为重塑民族自信心的新起点,也为疗治民族自卑增添了新的精神动力。

总之,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全面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基本确立的时代,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根本转变。此后,中华民族前行的动力彰显了主体内生性,中华民族前行的步伐具备了日益坚定的自信心。

三、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升华达到全新高度,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28]持续14年之久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与普遍形成、中华民族重塑民族自信的崭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29],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8]。在抗战壮举的震撼和抗战精神的感召下,“中华民族”概念成为中国社会第一流行词和中国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标志性符号,民族救亡意识和民族复兴意识潮涌中华大地,民族团结统一的整体意识不断深化,民族平等意识得到重视,中华民族理论建构成为热点课题并形成诸多共识,从而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和共同体意识基本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是彰显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观念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时代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贺麟、张君勱等迅即著文立说,率先揭起新一轮拯救与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帜,学术界、思想界闻风而起,毅然突破不同党派、思想与学术领域的藩篱,不顾艰难生存条件的限制,全力参与讨论和阐释中华民族救亡、团结与复兴问题;出版界不论政治倾向和规模大小,纷纷刊载文章,组织出版相关读物等,宣传关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共创民族复兴之机的思想^[30];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省议会、总商会、教育会、学生会等组织热忱呼应;各主要党派纷纷集合在中华民族复兴大旗下共赴国难。国民党政府以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者自居,运用国

家机器进行引导,宣扬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复兴”思想;国社党领袖张君勱以《再生》杂志为阵地,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宗旨,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发民族复兴主张;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与“平民教育派”,把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出路,全力开展实践探索活动,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城市推广到落后的农村地区^[31];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旗帜,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民族平等为原则,倡导民族区域自治,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亡的人民战争,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成为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走向团结统一的中流砥柱。

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和共同体意识基本形成的突出现象,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得到各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也成为当时教科书和流行歌曲的主旋律。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体现。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就开始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认同并使用。到20世纪30、40年代,更得到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同胞的普遍使用和高度认可。对此,黄兴涛先生的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有详细的梳理和呈现^[32]。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概念在教科书和流行歌曲中的普遍使用,同样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化与大众化。研究表明,20世纪20、30年代以来,中国史教科书中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占据主流地位,“用汉族、种族、人种等概念来指代中华民族的现象越来越少”^[33],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34]。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往往也体现这个时代的潮流律动,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民族情感与理想追求。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的流行歌曲,“中华民族”是一个常见“音符”。在《1931—1945 抗日歌魂:救亡图存流行歌曲》一书中,83首流行歌曲有13首直接以“中华民族”为主题词或关键

词,其它歌曲也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意愿^[35]。

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和共同体意识基本形成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理论研究与建构成为学界热点课题,并从更深层意义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彰显和民族复兴、民族平等意识的传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学界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迅速从“颇为缺乏”“专著太少”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36]，“中华民族”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突出主题。众多学者包括张君勱、吕思勉、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蒋梦麟、萧公权、萧一山、易君左、宋文炳、王桐岭、郭维屏、黄籀青、陈健夫、林惠祥、李广平、张元济、熊十力、张旭光、俞剑华、顾毓琇、钱基博、钱穆等的研究成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公开出版、广为流传、影响深远^[32]。这些成果在抗战洪流中孕育又经受抗战洪流的检验和洗礼,促使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各族人民是一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历史的演进造就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不同地域与历史处境造成了各民族的发展差距,应当消除民族歧视与不平等,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争取抗战胜利;应该保卫与开发边疆地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特别是剔除了“汉族同化”思想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主张日渐成为社会各界的追求。通过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整体性、多民族的统一性、保家卫国的一致性和民族融合发展的意识得到传播和彰显。

当然,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政治立场、主导思想和眼界视野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存在差异或分歧。譬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就突出强调中华民族的单一性,否认中华民族旗帜下各民族(包括汉族)的民族身份;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中华民族的融合性与多民族平等性质,对国民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

采取批评态度。

总之,经历百年沉沦与抗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政治属性凸显、“国族”追求坚定、革命革新意味浓烈,最终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37]

四、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这部历史在近代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留下了诸多启示:一是中华民族具有追求团结统一的强大内生动力^[2]。这个内生动力蕴藏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中,在中华民族近代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中得到全方位传承与重塑。影响巨大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和客观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亦新亦旧”的演进历史和现代样貌。二是中华民族一旦获得精神独立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学界流行的汤因比的“挑战一应对”理论和费正清等的“冲击一回应”学说,也不能完全解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三是培育民族自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形成历程,是一个遏制与疗治民族自卑、重拾与塑造民族自信的艰难过程,这个过程尚未完结。四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曲折发展历程表明,正是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28];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塑造了新中国,走向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大道。五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防御性特征,是爱国主义与世界关怀的有机统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从其本质和主流来说,

传承了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和谐、和睦的文化基因,体现了独立自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正义追求,具有鲜明的防御性特征,彰显了家国情怀与世界关怀的有机统一,这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38]。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112-113.
- [2]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
- [3]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1卷)近代史两种[M].熊月之,周武,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4] 俞祖华.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J].广东社会科学,2020(1):121-131.
- [5] 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5(3):5-14.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9-780.
- [7] 梁启超.梁启超作品精选集[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7.
- [8] [美]丁铎良.中国的觉醒 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M].沈弘,译.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10-11.
- [9] [英]伊莎贝拉·伯德.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M].卓廉士,黄刚,译.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71.
-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M].北京:中华书局,1905:1-4.
- [11]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1-12.
- [12] 刘解龙,张可荣.勇往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 [1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2.
- [14] 熊十力.论六经 中国历史讲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1.
- [15] 张可荣.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54-60.
- [16]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
- [17] 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8] 王占斌.五四运动时期的蒙古族青年爱国运动[N].中国民族报,2019-04-26.
- [1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 [20] 王建朗.五四运动:点亮中国光耀百年的历史火炬[N].光明日报,2019-07-18.
- [21] 张可荣.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华文明的当代启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62-68.
- [22] 颜维琦.爱因斯坦访沪留下的亲笔墨迹首次亮相[N].光明日报,2019-10-29.
- [23] 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J].近代史研究,2012(2):4-27.
- [24]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J].东方杂志,1921(4):41-52.
- [25]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5.
- [26]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5-217.
- [27]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17.
- [28]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3.
- [29]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3.
- [30] 张可荣.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1-86.
- [31] 张可荣.试论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67-72.
- [32] 黄兴涛.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3] 刘东梅.对民国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
- [34] 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J].安徽史学,2007(5):63-68.
- [35]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1931—1945 抗日歌魂:救亡图存流行歌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36]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59.
- [37]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9.
- [38] 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以中国共产党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8(3):41-51.